

2002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卫兴华 陈享光 邱海平

一、政治经济学

(一)经济理论著作的出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林丽琼、李郁芳、吴江主编的《经济热点问题探索》(上下两集),该书是由“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五次大会提供的论文汇编而成的,共四篇:“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关于收入分配”、“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综合经济问题”。

红旗出版社出版了由求是杂志社图书资料中心编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参考资料》一书,收入陈征、胡培兆、卫兴华、萧灼基、王天义、杨承训、杨国昌、李义平、高尚全、刘海藩、钱伯海、程恩富、胡代光、晏智杰、洪银兴、蔡继明、杨圣明、苏东斌、刘诗白、何伟等人的论文。其中有些观点差异很大,代表了各派的意见。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钧、樊建新主编的《深刻认识劳动价值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其中收入胡代光、有林等三十几位学者的论文或综述。共五部分:正面阐述和发展;争鸣和论战;分配问题;剥削问题;综述。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顾海良和张雷声著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阐述了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向赞成者的转变;《资本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体系;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劳动价值论的命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实践;劳动内涵的新变化;价值创造的意义;价值转化形态;国际价值的新形态等。全书的核心思想是坚持与发展劳动价值理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白暴力著的《劳动价值论热点问题》,着重研究了价值转型问题。并论述了“三要素创造价值理论的演进与理论困难”;“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理论困难”;“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白暴力著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作者提出了一个“六层次统一的价值价格理论”,第一层次是价格的本质,第二层次是价格最终基础,第三层次是价格直接基础,第四层次是市场价格运行,第五层次是绝对价格或价格总水平,第六层次是价格制定和价格管理。作者主要研究了前五个层次的问题。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志国著的《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研究》。主要观点是肯定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主张“从四个层面拓展劳动价值论研究”,“对一切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给予必要的分析和批评”。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凌云著的《劳动价值论新探》,提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理论,不能离开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这一科学基础”,“劳动价值理论有

巨大的历史张力和理论张力”。批评了用“效用价值论”、“均衡价格论”、“要素价值论”、“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不赞成用“要素价值论”来说明收入分配多元化的问题,也不赞成只谈继承劳动价值论,不敢做任何创新与发展,不赞成一些人在批驳一些观点时,“仍然习惯于运用马克思的语录,照本宣科,不做任何创新,完全无视实践的发展及其提出的新问题”。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由郭京龙、李翠玲主编的《聚焦劳动价值理论在中国理论界》,该书对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分成十个方面的问题,并摘录了每个问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逢锦聚、柳欣、周立群主编的《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究》。该书是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2001年10月举办的全国劳动价值理论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出版了由劳动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著的《劳动价值与分配新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该书总体上否定劳动价值论,主张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广义价值论。提出“要以要素产权收益论和价值贡献报酬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新的理论基础”。该书对价值提出的界定是“一般而言,广义的价值是指人们对各种事物是否于己有用及其有用程度所做出的判断。比如,氧气、阳光、水分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具有价值;绿树、青草、鲜花、秀美的风景,是人类良好的生活环境,因而具有价值;……在我作战中,一个险要的地形对于守方而言就具有有利防守的价值,……就人的价值而言,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很强,素质很高,又乐于奉献,努力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这个人就很有价值,反之,则价值很小或无价值。”“广义概念的价值,是指事物的功能对人们各种需求所产生的作用。”“商品价值是商品功能满足人民物质、精神生活和生产消费需求的作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泰岩、杨万东主编的《经济热点问题研究进展报告》,是对经济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研究的综述。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系列之一。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吴树青任顾问,逢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该书是高等学校经济类核心课程教材。全书分为:导论;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篇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纪宝成、杨瑞龙任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王天义和申振东著的《经济学热门话题的争论》、刘永佶的《民权国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

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苏东斌和钟若愚著的《劳动价值学说史略》。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王检贵著的博士论文(黄泰岩指导)《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了王国刚著的《中国资本市场热点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卫兴华经济学文集》(两卷本),这本文集主要收入了卫兴华 1987 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包括马、恩、列、毛、邓经济思想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经济改革问题研究;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与经济学的构建发展问题研究等多方面的内容。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义平著述的《经济学百年》,该书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对百多年来经济学史上的主要经济学理论流派进行了有选择性的介绍和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振中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3),主题是转轨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自 2000 年以来出版的第三部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柳欣、张宇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一辑),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合作出版的系列论文集的第一辑。该文集收入了国内外作者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若干新成果。

(二)对劳动价值理论讨论的进一步深入

1. 对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总体情况

主张在坚持劳动价值理论的前提下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成为主流观点,完全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绝对少数。然而,在究竟如何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问题上,经济学界的看法仍然不完全一致,主要的分歧在于,有的人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理论就必须扩展价值范畴的内涵,把非劳动要素确定成价值的源泉。而大多数学者则坚持认为价值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这一要素,把非劳动要素认作价值的源泉实质上是要素价值理论代替了劳动价值理论。

胡代光认为,我国有人提出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或者提出社会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包括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的观点,这些见解并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倒是像回复到马克思所批判的 19 世纪上半叶萨伊的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商品价值论和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李嘉图主义者的庸俗价值论,且还有所“创新发展”!^①

赵凌云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的理论体系,必须予以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绝对的、锁闭的,而是开放的、可以发展的。劳动价值论是不断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实践与认识的局限,迄今为止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主要限于它的外围层次;伴随实践与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发展劳动价值论。反对有人主张的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取代劳动价值论。^②

张雷声认为,无论社会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经济水平怎样发达,无论参与商品价值形成的要素怎样复杂,惟有劳动才是商品价值创造的本源。把劳动的范围由活劳动扩大到物化劳动上,从现阶段实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

配制度中去界定创造商品价值的要素的范围,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混为一谈,对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是极为不利的。^③

王珏和肖晖针对晏智杰的《劳动价值学说新探》提出不同意见:“那种妄图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杜撰出所谓的劳动价值理论‘新突破’的理论,……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其实质就是否认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就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④

蒋绍进和罗郁聪批评晏智杰为了宣传他的“生产要素价值论”,“肆意曲解劳动价值论。他设立三个所谓马克思价值分析暗含的前提条件,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他把原始的物物交换看作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立论的根据”^⑤,“这是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卫兴华发表长文,评论晏智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误解。^⑥

杨国昌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元论,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先进科学技术离开了活劳动的中介环节,其自身并不能创造价值,物化劳动是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但它如果不同活劳动相结合,只不过是一堆无用之物;服务业的劳动也参与价值的创造,但需要具体分析,只有对社会有益的活劳动才创造新价值。^⑦

左大培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并没有以劳动价值论来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按要素分配”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由这一类要素获得收入,首先靠的是这一类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置的评价体系。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关于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非劳动者依赖劳动者而生存的观点是最基本的思想,劳动价值论只是他的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理论上的具体体现。^⑧

李炳炎认为,在当前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要做到既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的基本原理,又结合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来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科学理论,必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准确区分价值的创造与财富的创造;二是准确区分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三是准确扩展生产劳动的内涵。^⑨

黄家骅认为,在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劳动价值论起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同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如马克思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需要更详尽地体系化;马克思关于“价值一元决定论”需要更信服的实际依据;马克思关于自然资源无价值的论断,需要更一致的逻辑推断过程;马克思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的关系问题,需要更周到的论述来填补其间的空白点。现代市场经济中五个条件的变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解释范围作了新的铺垫,这五个条件的变化是:从价值的平均决定到边际决定的转变,使得价值决定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完全信息市场假定到非完全信息市场的现实转变,使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的条件不同了;从实体经济主导到金融经济主导的转变,使得价值、价值量、价值规律的涵义都受到强烈的冲击;市场主体的新格局出现,使得要素收入成为主导性收入来源,价值分配的重要性超过价值生产;由于产权分散化和利润共享化的实现,同样改变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

配的内部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向我们展现了前所未有而且又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绝非按照劳动价值论的现成说法就可以一劳永逸,只有面对现实,勇于探索,才能有理论创新的通途。^⑩

蔡继明认为,传统的理论认为,价值是惟一由劳动决定的,非劳动收入是非劳动要素所有者凭借其要素所有权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事实上,非劳动要素所有权仅仅是参与分配的法律依据,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或价值尺度,是它们各自在价值创造中所作的贡献。^⑪

晏智杰针对不赞同他背离(曲解)马克思的原意、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否定的商榷意见,批之为“本本主义”,继续主张“劳动价值论同现实的差距与矛盾”、“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等。^⑫

2. 劳动价值理论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剥削问题

卫兴华认为,剥削有合法的与非合法的两类,对待剥削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从道义的原则去看,而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不是只讲剥削的不合理性,他们提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下剥削制度具有进步性。例如,恩格斯就曾经指出,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度,野蛮的剥削制度代替原始的公有制度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马克思也曾论述过: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在三个方面具有进步性,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向进步的社会制度过渡。^⑬

白暴力认为,从表象上看剥削问题似乎是按要素贡献分配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但实际上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必须解决分配主体的落实,即分配的主体必须由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承担。因此,剥削问题事实上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关系问题,从而剥削就是人与人之间对要素所有权的关系问题。^⑭

岳福斌提出,对剥削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过去学术界对剥削的定义存在内涵过于狭窄而外延过于宽泛的问题,因此应当对剥削范畴重新进行定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说的剥削,特指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垄断权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一种经济行为。因此,现实中那些凭借暴力和政治权力等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剥削。剥削问题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指的就是对剩余价值的分割是否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如果对剩余价值的分割有理有据,合理合法,从而使每个利益集团都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有法律依据的收益,那么这种分配方式中就不存在剥削;相反,如果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通过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获得收入,那么这种收入就是剥削收入。虽然地租、利润和利息在马克思的论述中都被看作是剥削收入,但现实中这些收入并不都是剥削。不仅私营企业中存在剥削,国有企业中政府如果无偿占有了应该归其他主体的利益,那么这种行为也是一种剥削行为。按照合理合法的标准对剥削的判断,“合法”指的就是是否存在政策的支撑点,而“合理”指的就是在 $C+V+M$ 这一公式中, C 和 V 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补偿。^⑮

李玉峰认为,当前学术界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合法与否来判断是否属于剥削。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生产要素多元价值论作为判断剥削的基础。这种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都参与价值创造,因此三种生

产要素分别获得地租、利润和工资。判断是否存在剥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是否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为标准。按照这种标准,当前我国私营经济中必然存在剥削。但是剥削的存在在目前社会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因而在理论上应当承认它,在政策上应当引导它、限制它。^⑯

钱津认为,承认剥削存在,同时又允许剥削存在,并不是要利用资本收益来保护生产资料所有者个人,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社会的生存发展。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满足人们物质消费的程度,因此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给予生产资料所有者一定的收益补偿,利用剥削的机制,在客观上达到保护生产资料的作用。^⑰

文魁提出了剥削研究中应当遵循的四项原则,即对剥削理论的研究不能模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问题;对剥削理论的研究不能模糊消灭剥削这一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对剥削理论的研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考察剥削历史;对剥削的研究不能脱离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⑱

张维达、吴宇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揭示价值的源泉,不是规定分配问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由公有制决定的,不是由劳动价值论决定的。我国有些学者指出两者不是同一的根据,没有内在联系,这是正确的。那种认为劳动价值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的观点,或者认为按劳分配是价值规律的延伸观点,都是一种误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很发达,并不存在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是按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参与分配。然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按劳动直接分配个人消费品,只能通过价值的迂回形式来实现。^⑲

谷书堂、王璐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并决定分配的观点是一种误解,因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等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总量指标,在现实生活中反映的是使用价值总量即社会财富量的变化,而不是价值总量的变化。可见,国民收入的分配实际上也是使用价值即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不是价值量的分配。而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创造是由劳动、资金和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会按照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即贡献)分到应得的份额。因此,结论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照这些要素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物质产品的分配比例。^⑳

王大超认为,剥削应分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主要剥削与次要剥削,私有剥削与公有剥削,我们应全面历史地理解剥削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主要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直接剥削,而现代社会经济中剩余价值的来源正从传统的直接途径向现代的间接途径转化,存在着间接剥削。如果将经济领域中凭借对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垄断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视为私有剥削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的其他类型的剥削,即某类人虽然并不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或流通资料的所有权,但却凭借对生产资料、流通资料及一切可支配利益关系的管理与控制权,同样可以无偿地、大量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这种公有剥削已成为愈演愈烈的一种经济行为。^㉑

邱海平批评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这样一种流行的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了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用劳动价值理论证明了资本家及地主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从而批判和否定了资本家

二、宏观经济学

(一) 通货紧缩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居民消费价格从1998年开始变为负增长,2000年略有上升,但从2001年9月开始,消费价格又陷入持续负增长状态,到2002年12月末,居民消费价格已有54个月是负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与消费价格走势大体一致。通货紧缩问题依然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种意见把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为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认为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是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和通货紧缩趋势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对这种“紧缩政策”进行调整,以切实实行“积极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扩张性货币政策。^②有的从我国货币供给的具体结构分析了货币政策产生的紧缩性效应,认为目前我国货币供给增长率虽然明显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但要看这几年货币运用结构上所存在的问题:一是投向实体经济的份额相对缩小,二是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又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大型企业,真正投到农村和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份额较小。因此,难免产生实体经济活动中货币偏紧的结果。^③

还有的学者从短期政策操作的角度分析了物价下降通货紧缩反弹的成因。第一,货币政策的导向致使企业部门出现“货币供给偏紧”;第二,货币供给中高流动性货币供给相对放慢,一定时期内不被直接动用的准货币过多;第三,银行存贷差持续扩大,银行将过多的货币投到了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领域(如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政府债券购买等)。因此,作为短期性对策选择,当前应突出强调在继续坚持稳健货币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放松货币,通过货币的结构性松动,改变普遍存在的萧条预期,抑制通货紧缩趋势。^④

另一种意见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并无“紧缩”效应,目前发生的通缩态势与其无关。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供给平均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之和平均高出6~7个百分点。因此,不能说这一时期的货币供给是紧缩性的。这也是当前占主流的观点。^⑤

(二) 内需不足的研究

内需不足是我国近几年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态势。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通货紧缩趋势的存在和经济增长的乏力。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多项启动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却见效不大。所以,探讨需求不振的原因,寻找启动内需的有效途径仍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关于需求不足的原因。对需求不足原因的分析多集中在消费需求不足上,在这方面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收入分配不均足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有的学者根据对收入分配与总需求关系的认识,建立了一个用于解释我国消费不振的理论框架,证明了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总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他们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平均储蓄倾向,将收入从高到低分为四个层次。通过将这四个层次中人均财富的对比,解释了我国消费不振的重要特征。我国当前总储蓄中的相当大部分是由极少数高收入阶层拥有;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和预防性储蓄倾向低,而遗赠储蓄倾向高。这是我国当前消费不振的关键。所以,仅仅将预防性储蓄看作是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是不完全的。^⑥

另一种观点把消费不足的原因归结为收入相对分散化

和土地所有者阶级。邱海平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并不单是为了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把劳动价值理论理解为一种在道德上为劳动和劳动者辩护的理论,进而理解为在经济上消灭剥削和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根据,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剥削有罪论”。^②

赵振华认为,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其关键和落脚点都是对剥削问题的认识或再认识。他提出,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剥削,指的是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以外的一切其他收入。并提出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剥削与财产多少和收入多少没有必然关系。第二,要产生剥削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政策法律条件,经济条件主要是劳动力除了自己的生存之外,能够提供劳动剩余,从企业来看,赢利是剥削的基本条件。从政策法律条件上看,凡是照章纳税、具备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障、工人工资达到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企业就不具备剥削的法律条件。第三,私有财产不一定产生剥削。第四,剥削既存在于生产和流通领域,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第五,剥削的主体不仅可以是个人,而且也可以是法人,如垄断行业利用垄断地位制定垄断高价,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同样属于剥削行为。第六,不劳而获不一定是剥削。第七,用剩余劳动养活的人不一定是剥削者。第八,雇佣劳动不一定都产生剥削。我国的家庭服务人员如保姆等显然不存在剥削关系。第九,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有缺陷,主要有:马克思把资本家的管理劳动看作是剥削活动,假定资本是没有风险的,马克思假定资本家投资于企业都是赢利的、没有分析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为国家上缴的税收用于政府开支、保障国家安全、转移支付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部分。^③

蔡继明认为,所谓剥削,就是在利用(开发)他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时所付报酬低于其贡献,其实质是对他人要素贡献的无偿占有。因此,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是它们各自在价值创造中所作的贡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即生产要素的贡献就是边际产品收益,即最后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所引起的总收益的增加,它等于边际产品乘以边际收益。剥削是对他人生产要素贡献的无偿占有,以非劳动生产要素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具有剥削性质。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本质上是按各种生产要素(包括非劳动要素)在价值创造中所作的贡献进行分配。^④

3. 对于西方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的剖析和批判

白暴力对西方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进行了概括总结,他把这种否定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两种类型,并对西方经济学家的有代表性的否定性观点,如均衡价格理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否定价值转形论、多余论等进行了分析批判,得出了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是不能成立的总结论。^⑤

杨玉生对西方经济学家围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所进行的争论进行了述评,重点介绍了恩格斯和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批判;德赛以及爱德华·内尔和森岛通夫对于萨缪尔森的批判;苏珊·希麦尔维特、西蒙·莫恩、伊藤诚和安沃·塞克对斯蒂德曼的批判;介绍了多布、斯威齐、曼德尔、德赛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论证和肯定。他还介绍了邓肯·K·弗利和迪梅尼尔·热拉尔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新解释。^⑥

和消费品销售需要收入相对集中化的矛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主导消费品不断变化的过程,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当前出现了收入相对分散化和消费品销售需要收入相对集中化的矛盾,这最终导致了当前主导消费品的销售的断层,构成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②

对于扩大需求的对策研究,主要提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以结构调整带动扩大内需,并提出近期结构调整的领域:培育、推动住宅、汽车等新型主导产业;放宽行业限制;加强行业重组,提升制造业整体水平;放宽农民进城限制。^③二是针对当前主导消费品销售断层,认为启动消费的最有效手段是信贷消费。因为利用信贷消费可以实现收入的相对集中化,即由银行将分散收入集中起来,分期分批贷给每一个想购买消费品而苦于资金不足的居民。从而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与转换,扩大需求。^④

(三)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1. 财政政策

(1)关于积极财政政策退出问题

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至2002年已有四年时间,这期间国家共发行了5100亿元国债,带动了银行贷款与地方投入,形成了两万多亿元的建设规模,对我国这些年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成功的范例”^⑤。但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债务依存度也迅速提高,债务总额大量增长,相应带来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国内有如下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具有一些负面影响,但不应退出,应对其内容进行必要调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强劲;二是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三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警戒线。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缓慢恢复,但不确定因素仍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自主成长机制缓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资的拉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逼近警戒线,但还有伸缩余地。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形势明显还处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通货紧缩现象存在的阶段,这种情况也要求我们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应以适度从松为宜。鉴于上述情况,积极财政政策还不能退出,只需对其内容加以调整。^⑥

第二种观点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短期性的,不应将其中期化,甚至长期化,应看到这项政策存在的各种消极效应和可能带来的风险,降低这项政策的力度,让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他们认为,这几年经济的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扩张性经济政策,虽然,当前这项政策的强度和力度尚未出现减弱迹象,但其边际效应已明显出现递减趋向。尽管近几年它推动了内需增长,但在启动经济主体内生增长机制方面却并未起到积极作用。对久已存在的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但未起到防范和化解作用,相反,增加了隐患。因此,扩张性政策应逐步淡出,适时转型,宏观政策重点由支撑经济快速增长转向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淡化扩张性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停发国债,立刻消灭赤字,也不意味简单地用紧缩政策取而代之。^⑦

有的学者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同时,认为仅仅依靠国债投资拉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虽然我国债务余额与赤字占GDP的比重都在接受范围之内,但考虑我国的财政风险不能简单看这两个比例,还要仔细分析我国财政自身的特点,权衡各方面得失。此外,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益也呈逐步递减趋势,项目储备越来越少,所以,它不能也不宜成为我国中长期宏观政策。当然,迅速淡出,目前也不具备条件,因为缺乏替代其退出后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因此,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短期内还要实施,但应开始降低力度,逐步淡出,而不能继续加大政策力度。^⑧

有的学者对财政政策的效应及国债与通货膨胀的动态稳定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这种分析,他们认为总体上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长期持续。何时退出,取决于多种条件。因为积极财政政策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严峻程度、政治家数量扩张偏好和政治周期等变量的增函数;是边际效应递减、财政风险、国际趋势、培育市场力量的减函数,积极财政政策的走向,是由积极财政政策的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根据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积极财政政策的肯定力量还将在一段时期持续和占上风,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有望在2005年以后退出。^⑨

(2)减税问题

我国的现行税制是在1993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制定的,许多政策都带有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目的。但是,1998年以后,有效需求不足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这种情况下,现行税制和税收政策的一些规定便与我国扩大需求、抑制通货紧缩、促进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不相适应。再加上,近两年税务部门加大了征管力度,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背景,于是提出了要不要减税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种主张减税,一种反对减税。

主张减税者认为,我国实际税负水平高,减税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由于我国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应综合考虑税收问题。首先,税收作为政府活动的财源,其规模大小,是增是减,直接取决于政府支出的规模。如果我们必须减税,则有关减税的安排与压缩政府支出规模的举措必须同步出台。并且,减税与减支相权,后者应放在优先位置。否则,减税单兵突进的结果可能就是“以债补税”,或“以费补税”。第二,为应对当前的通货紧缩,税收和支出政策应进行调整和改革,凡属于制度性变革,作为长期战略确立的调节事项,可纳入税收政策,即,减税不是权宜之计而应是战略措施,致力于制度创新。第三,减税并非因为当前“增税”不适于宏观目标而致,当前税收收入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长、征管力度加强与“费改税”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背离减税政策的结果。第四,当前中国,企业、居民所承受来自政府的负担,并非只有税收。事实上,非规范的政府收入比作为规范性政府收入的税收还要多。因此,在为企业和居民减负的安排中,与其减税,不如减费。第五,“实际”税负水平由税基、税率和实际征收率等因素决定。由于现在实际征收率有较大提高,与1994相比,我国的实际税负水平已有相当提高,就税制本身而论,确有减税必要与可能。^⑩

有的学者通过对我国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也发现,从宏观税负来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这几年,税收收入超常增长,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这同实质上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明显不一致。从结果上看,四年来我国税收弹性系数和宏观税负的提

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提高了。从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看,我国应采取适度减税政策。^①

还有的学者认为,1994年新税制后连年增长的税收,也是导致现在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税收对总需求具有较大的收缩效应。目前税收政策的紧缩作用,被增发国债进行投资抵消或掩盖了。这种税收的高速增长在经几年时滞后将经济产生严重紧缩作用,届时积极财政政策退出将陷入困境。因此,必须采取一定减税措施。^②

关于如何减税,学界尽管有不同的具体主张,但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鉴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仍然偏低,通过大规模减税扩张需求的条件尚未具备,应该对现行税制和税收政策进行适当的结构性调整,其着力点主要包括:增值税转型、公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理调整消费税目、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优化税率、加快税费改革等。

反对减税者认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还比较低,只有百分之十几,国外为30%左右,在我国尚需提高“两个比重”的要求下,减税是不当的;同时我国的税制结构不是所得税为主体,这种体制的减税效应不大。

2. 货币政策研究

(1) 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研究

在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依然受到通货紧缩困扰的情况下,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实行积极或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这一问题大多都认为,应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贷款有效需求不足;商业银行自我约束能力弱,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失衡,而不是货币供应不足。在此情况下,如果实行过分扩张的货币政策,不但无益于防止出现通货紧缩趋势,而且还会危害宏观经济健康发展。^③

有的学者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货币供给的“溢出”效应对货币的“中性”或“非中性”的影响。实证分析证明了随着我国由资源约束型短缺经济向需求约束型过剩经济过渡,货币对实质经济的影响处于由“非中性”向“中性”转变的过程之中,货币政策对扩大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从而排除了以货币政策的独立操作来扩张有效需求、支持经济增长的可行性;从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分析,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至少存在着货币存量、国民储蓄和政府投资三个方面的空间,财政扩张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和通畅的投资渠道,“挤出”理论并不成立,因而毫无必要为弥补财政的资金缺口动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旨在实现并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定位应该是介于紧缩与扩张之间的中性货币政策。它将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挂钩,具有操作上的独立性、灵活性和主动性。^④

(2) 关于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选择问题

我国货币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从直接调控到间接调控的转变。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被确定为“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通货紧缩趋势的发生,对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选择出现了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目前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之间仍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可以通过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对其加以调节。因此,中国目前仍需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⑤有的学者对我国利率、货币供应量

的可测性、可控性及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在当前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依然具有现实合理性,目前我国并不具备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条件。随着金融对外开放及金融自由化的推进使货币供应量可测性与可控性减弱,我国可以一方面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积极创造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条件。^⑥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宜把货币供给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种观点认为,货币供应量虽然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程度与可测性都日渐下降,在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之后,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国经济当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就显现出来,这些矛盾并没有在货币供应量上得到应有的反映,也无法单靠货币供应量调节和解决。货币供应量已经不能全面反映货币运行规模与结构问题。因此,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到了该改革的时候。^⑦另有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的。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是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⑧

(3) 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

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其有效性在我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有的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预测分析方法,对中国1993-2001年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他们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的共同传导发挥作用的,相比之下信用渠道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信用渠道的传导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以其为主要传导途径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因此增加有效信用供给成为提高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⑨

有的学者认为,货币政策上未能实施有效的反周期货币供给管理操作,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他们依据利率管制制度下IS-LM模型的配额均衡推导出中国总需求函数 $Y = D(M/P, R)$,蕴涵仅货币政策有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无效的需求管理政策含义。在此基础上运用货币政策效应测度的特定指标体系和算法程序,考察了1981年以来中国货币供应与国民收入的历时动态及其协同运动性质,有关类型化解释结果表明,其间中国货币政策未能实施有效的反周期名义货币供应管理操作,而基于货币政策规则的货币供应目标比较也揭示了1998-2000年间中国货币政策存在紧缩倾向。^⑩

(4) 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对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实证方面。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有的学者发现,在中国经济中消费物价指数与货币指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这说明从长时段角度看,货币是消费物价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短期看,货币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有两阶段:第一阶段是新增的基础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时间短,影响小,只是基础货币增长率的3.2%;第二阶段是广义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时间长,影响大,短期内通货膨胀主要是广义货币引起的。因此,通过持续的资本市场创新,增加各种金融衍生品和各种直接投资机会,就可以吸收大量新增基础货币,减少广义货币的增加,降低对通货膨胀压力。^⑪

有的学者在将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于检验泰勒规则的过程中发现: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GMM估计表明,通货

膨胀率对利率的调整系数小于1,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在这一制度下,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我实现机制。同时指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不足,而对产出的反应过度。^②

三、微观经济学

(一)企业理论

1. 关于企业性质的研究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将企业理解为一组合约关系的联结。企业这组合约的本质是什么?有的学者认为,企业的性质在于企业是市场中由要素所有者签订的一组不完备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包括要素投入,要素使用权(核心是剩余控制权)的行使以及要素增值的分配(核心是剩余索取权的行使)以及企业组织资本与组织资产的创造和使用等,这一过程融交易功能与生产功能于一体。该组合约的关键内容在于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的安排。作为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企业与市场是不能截然对立分离的,即要素市场,资产及服务市场等与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签订与履行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③

有的学者通过对科斯替代逻辑的反思,重新考察了企业与市场的相关关系。认为交易费用的提出虽然打开了新古典企业的“黑箱”,但是由此来解释企业的性质,其结论与现实相悖。他们建立了一个趋于古典的分析框架,发现企业与市场是分别建立在两种不同但有紧密相关性的分工基础上的,因而它们各自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源于一般分工与个别分工各自的性质及其相关关系——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合约,而市场则是商品所有者交换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两者互补而不相互替代。这一结论较好的解释了实体经济中不论是企业规模,还是企业数量都在不断扩张,同时市场范围随之不断扩展,两方面相互促进、正相关推进发展的现实。^④

关于公有制企业的性质问题,有学者认为,相对于私有企业的市场合约性,公有制企业是政治性组织。这种政治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产生和经营的目的及手段具有政治性、产权基础需用政治规则以及管理结构包含政治程序。正是这种政治性决定了公有制企业双层代理结构,决定了公有制企业的低效率。^⑤

2. 关于治理结构的研究

在对治理结构的研究中,股东至上主义的理论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和批评。有的学者认为,企业组织不是单个个体的机械组合,而是组织成员个体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的整体和不断演化的有机体,在本质上是以知识分工为基础的组织成员个体之间专业化生产与协作的组织形式和契约形式,具有“生产”与“契约”两重属性。相应的,企业治理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契约”问题,而是两种基本规定性及其相应作用和演化的结果。从现实性看,企业组织的专业化生产是组织成员个体决策的分工和协调及其相应的决策权的分配过程。在决策权的分配过程中,企业组织的决策效率同时面临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双重约束。在这种双重约束下,企业决策权的最优配置是企业知识分工和知识积累及其演化发展的结果,是企业最优所有权分权的常态。^⑥

有的学者通过对近来美国公司信誉危机的分析,说明“一元制”公司治理是美国公司发生信誉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主要表现在:股东至上主义的理念;公司决策过度集中于单

一组织及个人,主要依靠公司外部监管的监督约束机制;过分崇尚股权激励机制。这次美国公司会计丑闻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应尽快扭转目前这种美国化趋势,回到《公司法》厘定的基本框架上来,按照“二元制”公司治理的构想来探索我国公司治理的走向。^⑦

有的学者从企业权力的变化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及其转变。认为,企业中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权力的大小,取决于个体对有价值的资源的控制权。由于企业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企业中的权力需要通过进行不断的谈判来重新界定。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由于非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为稀缺,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企业的权力掌握在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手中。但是随着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中的权力逐渐掌握在人力资本所有者手中。这种企业权力的变化必然引起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在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逐渐拥有更大权力的条件下,仅仅从解决代理问题的角度来理解公司治理是远远不够的,应从单纯的讨论如何从追求出资者价值的最大化转向设计如何控制和留住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机制。^⑧

有学者从股权结构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说明国家股东治理效率低下,法人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积极作用,分散的流通股东在证券市场浓重的投机气氛下很难在公司治理中有所作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使公司治理效率趋于最大化。^⑨

(二)消费理论

1. 关于消费函数研究

消费函数在经济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学者结合我国的国情尝试着建立消费函数。他们采用跨期最优消费选择理论和相对风险厌恶(CRRA)效用函数,建立了一般形式的消费函数,然后结合具体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预期形成机制推导出消费函数的各种可能形式。在所推导出的消费函数的理论结构基础上,他们根据中国的经济具体情况,特别是农村和城镇具体约束条件中的差异,估计了农村和城市的消费函数。^⑩

有的学者在分析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中,建立了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他们首先引入了一个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不完全替代性质的居民有效消费函数,同时引入一个个人风险效用函数,建立了一个改进Tsong-wu Ho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然后通过这一模型,利用计量经济方法研究了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出了民间消费支出。^⑪

2. 关于消费者行为特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学者把这种变化概括为:(1)平均消费倾向下降;(2)边际消费倾向下降;(3)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低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这些变化很难用通常的绝对的收入假说,永久的收入假说或生命周期假说来说明。有的学者考察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及其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上述变化作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1)制度变革增加

了消费者不确定性预期,产生预防性储蓄;(2)流动性约束压低了消费者的当期消费;(3)低收入和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导致了居民的短视行为;其中不确定和流动性约束的增强是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⑤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具有跨时最优的特点,在考虑环境约束的条件下,预期和机会成本变量对消费需求具有正常的影响;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影响其消费的主要是本期收入、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而存款利率对其消费无显著影响;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影响其消费的主要是本期收入、通货膨胀率和存款利率,而其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对其消费的影响是存在的。^⑥

另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是导致我国总消费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与传统观点认为收入与消费倾向简单的关系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平均总消费倾向在收入水平上呈马鞍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遗赠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正相关,而预防性储蓄与收入水平负相关,后者是中国及其他类似结构的经济体独有的特征。^⑦

(三)市场及市场结构问题

1. 关于垄断与竞争的研究

对于垄断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自然垄断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自然垄断产业多为网络性产业,必须考虑其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和统一兼容性;而且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分拆必然导致经济效应的丧失。从总体上看,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真正症结在于政企不分而非垄断;就反垄断目标而言,由于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垄断多为行政割据型垄断,而不是经济集中型垄断;经济集中型垄断只是一种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没有必然联系,所以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反垄断应该指向包括行政割据型垄断行为在内的各种垄断行为,而不应该指向垄断结构,特别是经济集中型垄断结构。^⑧

电信业是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先导,其管制与竞争问题是近些年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对电信业的研究更多地放在放松管制和电信市场结构—行为—绩效模型(SCP)的分析研究上,忽略了对电信管制机构本身的研究,包括管制机构体系设置的合理性、权责范围、相关部门间的监督制衡等方面,而管制机构本身的体制问题有可能直接影响到管制的效率,从而影响电信产业的改革与发展。基于此,他们比较分析了美英两国的电信管制体制并从中提炼出了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和启示。^⑨

我国某些行业普遍出现的过度竞争引起人们关注,有人提出竞争会导致经济效率劣化的论断。对此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分析竞争与效率的关系应从本质上认识竞争,竞争是厂商的行为特征,与完全竞争不是一个概念,竞争关键在于竞争的自由。在实际的经济中,竞争的自由往往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的效率损失与竞争无关。“过度竞争”与垄断一样,是竞争自由受到限制的结果。因此“过度竞争”的低效率不应归因为竞争,而应归因于限制竞争的因素,在我国这些因素包括企业制度缺陷和一些行业的行政性禁入、禁出等。^⑩

2. 关于不同行业市场结构问题的研究

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统一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形成,对市场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不同行业市场结构问题的研究上。在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的研究中,有的采用H指数将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高度寡占型、低度寡占型、低集中竞争型、分散竞争型、高度

分散型和极端分散型。在此基础上,根据前8位集中度(CR_8)和企业数量大小,对各种基本类型进行细分。研究发现,无论是与美国还是日本相比,目前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都属于一种典型的高度分散的竞争型市场结构,绝大部分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很低,产业组织高度分散化。在各个制造业行业中,原子型结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角度看,我国今后需要的将是一个以促进有效竞争为基本目标的适度集中的寡头主导型市场结构。^⑪

在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结构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农产品结构表现为如下特征:在农产品的首次销售中,数量众多、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面对着相对较少的买方,在最终销售中,是相对较少的卖方面对众多的、分散的消费者,如此,形成了一个双喇叭形的结构。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农户处于相对不利的市场地位,买卖双方缺乏有效的竞争。我国农产品市场结构不仅具有喇叭型的典型特征,而且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得到不断强化,其喇叭口径更大,使农户处于绝对不利的市场地位。这种结构形成与不断强化的原因在于:(1)农产品经营风险防范机制与调控体系的不完善;(2)农户生产规模受到农业生产要素供应体系的制约;(3)农户自身组织化受到各方限制,发展缓慢;(4)缺乏抑制农产品流通组织垄断情况机制。^⑫

在对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研究中,有的学者发现:中国目前投资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基本上是垄断与竞争并存,在近年来垄断因素逐步加强,但是这一趋势却根植于人为垄断。中国投资银行业超额利润也源自这一人为垄断因素。同时,由市场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投资银行业的市场行为十分单一,业务竞争严重趋同。因此,为了在金融业开放的5年缓冲期内形成可与国外投资银行相抗衡的竞争力,政府应逐步解除人为垄断,使中国投资银行逐步走向行业的自然垄断或集中;同时中国的投资银行也应实行产品差别化策略,积极向创新型和引申型业务拓展。^⑬

跨国直接投资是否会导致垄断行为,一直是国内外关注争论的问题。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从中国的实践看,虽然跨国公司规模大,而且在海外市场上有垄断愿望和垄断行为,但是,与许多国家较早时期的封闭状况相比,进口商品的竞争,多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及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竞争,会大大减少少数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居于控制地位、谋取垄断利润的可能性。将“跨国公司”视为一个利益整体,认为“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市场”是不恰当的。因为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自不同的跨国公司,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在中国市场上主要是竞争关系而不是稳定的串谋关系,因此,即使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上占有较高份额,但若这个份额由多家跨国公司分割,就应视为竞争性市场而不是垄断性市场。^⑭

有的学者以家电业为例,解释了跨国投资大量进入非但没有引起中国家电市场集中度明显提高,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末还表现出集中度提高阻滞的现象。他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在1990年大规模进入中国家电市场具有“战略性防卫”性质。再加上我国许多家电企业都是以内资国有资本和跨国公司合资形式存在,也使得跨国公司间、国有资本之间难于合并、兼并。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家电市场并不利于市场集中度实现。^⑮

四、国际经济学

(一) 国际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研究

流行的国际贸易战略通常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这种贸易战略的适应性或有效性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检验。有的学者认为,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虽然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收入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拉大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他们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并非对所有国家在任何环境下都普遍适用,当少数发展中国家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时,它们能够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国际市场,贸易条件就会持续恶化,导致“合成谬误”。因此,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再简单地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基于自然资源的外生比较优势,而应当推动技术进步,利用内生的比较优势来改变自身在长期中的总的比较优势,在动态中改变比较优势等级,从而在较优的国际分工地位上参与国际分工。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⑤

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比较利益陷阱,即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贸易中,虽然能获利,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比较优势战略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动态贸易利益。如今国际贸易的目的已不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在于占领市场,分享国际间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的成果。要想获得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就必须将本国的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实施竞争优势战略。因为,比较优势更多地强调各国优势的潜在可能性,竞争优势则更多的强调本国优势的现实态势。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按比较优势所确定的贸易形式也并不一定会转化为现实的贸易形式,只有在比较优势产品转化为竞争优势产品之后,这种转变才能完成。^⑥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贸政策应作相应调整。他们认为,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与国际贸易运作的现实所存在的矛盾,显示出贸易自由化的渐进性;完全自由贸易政策实施的保障条件揭示出贸易自由化过程的渐进性逻辑。由于贸易自由化的渐进性逻辑与国家的存在,在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中,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总是交织在一起,既没有完全的自由贸易,也没有完全的贸易保护。我国加入WTO后,短期对外贸易政策应定位在没有自由化过程中的合理保护,即开放型有管理的自由贸易政策。这种贸易政策的基点是适度贸易保护,目标是扩大出口。^⑦

(二) 人民币汇率问题理论

我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人民币是继续钉住美元,还是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没有改变,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人民币钉住美元制可能还要走更远的路。有的学者认为,目前钉住美元制的选择与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政府与经济代理人的浮动恐惧,我国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环境的约束有关。钉住美元制对中国经济

的总体增长是有好处的,汇率稳定对外贸出口和资本流入起到了稳定预期的作用。但是,钉住美元制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增加了财政政策的压力和实质经济部门调整的压力,也使中央银行承担了巨大的外汇风险,影响资源的总体配置效率。这种制度在资本管制有效的情况下是可以维持的。从长远看,从固定走向灵活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未来取向。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改善目前的贸易结构,完善和培育金融市场,把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平稳过渡与国内的整体改革联系起来。^⑧

对人民币实际汇率问题,学界作了很多研究。有的学者采取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00年期间人民币实际汇率状况,估计出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进而测算了实际汇率错位状况。其研究结果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被高估。改革开放后,均衡实际汇率长期处于贬值状况,现实的实际汇率长期被低估。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出现了明显高估:1997和1998年高估分别达18.3%和18.5%,到2000年实际汇率的高估状况得到根本性缓解,仅为8.8%。^⑨有的学者通过采取双边贸易模型计算出人民币的有效汇率指数并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并公布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也得出同样的结论:9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呈现明显的V型,1993为V型底部。1995年以前人民币基本上是低估的,自1996年开始高估,至1999年程度下降为6%。^⑩

有的学者运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对加入WTO后,我国关税税率调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改变、财政政策调整对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的长期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降低进口品关税使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而政府增加税收,减少对贸易品的消费则有利于人民币的保值和升值。而国外实际利率下降,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降低都将引起人民币均衡汇率贬值。^⑪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应当实行微量调整汇率以适应国际经济中对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适度降低利率以适应美元利率,率先在出口企业中实行增值税转型。这样做既降低了我国金融风险,又拉动了外需的增长,还保持了内需的持续发展以及对外贸的吸引力。同时使经济对汇率、利率和税率的变化引起的波动减少到最小。^⑫

(三) 国际投资问题研究

1.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

(1)关于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因素。有的学者通过对全球58个国家1996-1998年27个投资环境因子的分析,说明了一个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多少,由其潜在的和现实的市场规模、盈利机会、城市化水平和偿还外债的能力四个因子决定;他们通过对我国1978-2000年34个投资环境因子的分析,说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年际变动主要受现实的市场规模和应用性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对全国30个地区2000年30个投资环境因子的分析结果显示,一个地区当年和累计外国直接投资(FDI)主要由各地区经济外向度、应用性科技发展水平和通信设施状况决定,当年外国直接投资还受公路交通发展水平的影响。^⑬

有的学者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影响。其结果显示,除了市场容量、劳动成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以外,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区域性选择和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认为,各地区应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以提高引用外

资的能力。^②

(2)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地作为实证问题来研究。有的学者利用1985-1999年的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对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与外商投资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其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应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对于缩小地区差别具有重要意义。^③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运用多维方差分析模型,对我国地区间GDP差距、国内投资数量差距、国内投资效率差距、FDI数量差距和FDI效率差距等关键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FDI的区域分布并不能有效解释各地区经济的不平衡状况,相反,国内投资的区域差距、特别是投资效率上的显著差别,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因此,以消除投资效率差异为核心的区域政策取向至关重要。^④

有的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体现在对GDP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出口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强研究与发展能力的贡献等诸多方面。虽然我国内资已比较充裕,外资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我们还应继续积极利用外资。此时吸引外商投资的最大意义,是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促进资产质量的改善。因为提高资产质量所需的创造性资源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技术开发与使用能力,国际市场开拓能力、管理能力、对客户需求的理解能力等,都会随着跨国公司的投资一同进入国内。外资不仅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⑤

另有学者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了我国外生的资本流入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对一国实际汇率产生影响,而这主要取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用途。如果一国是小国经济,且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流入贸易品生产部门,那么就会引起实际汇率的升值。由于我国一直是引导外资投资于工业部门(主要是贸易品生产部门),而非服务业,因此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导致我国实际汇率的升值,尤其是1993年以来,随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大量增加,这种影响更加显著。^⑥

(3)关于我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有的学者采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因果分析三种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因子分析与因果分析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说明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不是投资环境恶化,中国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采取的差别政策待遇或制度性缺陷导致非法资本“洗钱”行为引起的,中国的资本外逃很大程度上是“过渡性资本外逃”。^⑦

2. 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

随着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传统的钱纳里“双缺口”模型与我国现实不符,不能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依据。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对我国资金供给与需求、资金效率以及其他资源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资金均衡动态模型,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认为,目前

我国本币储蓄和外币储备处于该模型较高的双丰裕位置,宏观与微观决策偏好相背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使投资者或以自有外汇或用人民币购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同时从储蓄和外汇两个方面拉动投资,把我国目前的本外币存量优势转化为流量优势,从而达到模型中的“稳定回归点”。同时,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如果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之间长期存在着严重失衡状态,将会导致国际收支表中直接投资利润汇回项目的较大逆差,从而对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从宏观上分析,我国也应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⑧

(四)关于资本帐户管制的研究

我国加入WTO后,许多学者认为,由于资本项目管制的成本太大,而且加入WTO势必削弱资本项目管理的的有效性,因此,中国需要加速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我国虽然加入了WTO,但仍应该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特别是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因为诸多原因使得快速开泄资本项目管制的风险和代价都很大:(1)三元悖论,即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同时实现;(2)银行过度惜贷症;(3)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4)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5)转轨经济中的资本外逃等。同时,他们提出,为适应加入WTO后面临的新挑战,中国可以改进资本项目管制的方法,如针对短期资本流动征收登记费;加大外债登记管理的力度;加大对银行系统审慎监管的力度;建立适时的电子管理系统等。^⑨

另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实现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市场制度建设水平。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的基本面和结构上都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弱小和不规范。巨额的不良金融资产、脆弱的银行体系等,这些问题存在的内在原因是市场制度建设的缺陷。因此,中国加入WTO虽然标志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但并不意味着要加速实现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而应将其视为长远目标,采取积极态度,抓紧市场制度建设,同时对资本项目实行有限度、有区别的逐步开放政策。^⑩

注释:

①胡代光:《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载《经济学动态》,2002(1)。

②赵凌云:《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特征及其发展》,载《经济评论》,2002(1)。

③张雷声:《理解劳动价值论发展劳动价值论》,载《高校理论战线》,2002(1)。

④王珏、肖晖:《是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大突破?还是重大误解?——有感于〈再评晏智杰教授的〈劳动价值学说新探〉〉》,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转轨通讯》,2002(3)。

⑤蒋绍进、罗郁聪:《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价值论”》,载《当代经济研究》,2002(3)。

⑥卫兴华:《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与思维方式》,载《经济评论》,2002(4)。

⑦杨国昌:《深化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要正确理解价值的源泉》,载《中国经济问题》,2002(2)。

⑧左大培:《重新理解劳动价值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6)。

⑨李炳炎:《关于重新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若干问题》,载《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2(1)。

⑩黄家骅:《坚持·完善·创新——论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载《东南学术》,2002(1)。

⑪蔡继明:《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不等于剥削》,载《学习论坛》,2002(1)。

- ⑫晏智杰:《本本主义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与思维方式》,载《高校理论战线》,2002(9)。
- ⑬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剥削观与我国的现实》,载《经济学动态》,2002(3)。
- ⑭⑮⑯⑰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剥削与劳动价值理论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2)。
- ⑱张维达、吴宇晖:《关于劳动价值论中的分配问题》,载《当代经济研究》,2002(2)。
- ⑲谷书堂、王璐:《价值创造、产品分配与剥削关系的嬗变》,载《南开经济研究》,2002(6)。
- ⑳王大超:《关于剥削范畴的历史比较与反思》,载《税务与经济》,2002(3)。
- ㉑邱海平:《关于新一轮劳动价值理论的争论——兼谈如何科学评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载《河南社会科学》,2002(1)。
- ㉒赵振华:《刍议剥削问题》,载《中国经济问题》,2002(1)。
- ㉓蔡继明:《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不等于剥削》,载《学习论坛》,2002(1)。
- ㉔白暴力:《西方经济学对劳动价值理论否定的演进、类型和分析》,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1)。
- ㉕杨玉生:《评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
- ㉖王松奇:《扩张性货币政策:选择理由及操作建议》,见 <http://www.stocknews.com.cn/ztjy/hgjj/200204100723.htm>。
- ㉗夏斌:《当前企业货币资金是紧还是松》,载《经济日报》,2002-07-12。
- ㉘刘国光、刘迎秋:《结构性松动货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载《经济研究》,2002(10)。
- ㉙戴根有:《对当前货币政策有关争议问题的看法》,见 <http://www.stocknews.com.cn/ztjy/hgjj/200207100481.htm>。
- ㉚朱国林等:《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载《经济研究》,2002(5)。
- ㉛⑳周学:《消费信贷:一个比政府投资更能启动内需的宏观调控手段》,载《经济学动态》,2002(5)。
- ㉜刘世锦:《以结构调整带动扩大内需》,载《宏观经济研究》,2002(1)。
- ㉝项怀诚:《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载《经济学动态》,2002(6)。
- ㉞刘国光:《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的提示与政策取向》,载《经济学动态》,2002(11)。
- ㉟于祖尧:《解析经济形势 探讨政策走向》,载《经济学动态》,2002(8)。
- ㊱吴树青:《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9)。
- ㊲⑳㉑㉒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评价与展望》,载《管理世界》,2002(5)。
- ㊳高培勇:《减、分税与抉择》,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8)。
- ㊴戴相龙:《中国今后几年的货币政策》,载《国际金融研究》,2002(4)。
- ㊵吴军:《稳健货币政策的理论思考》,载《金融研究》,2002(11)。
- ㊶丁文丽、刘学红:《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载《经济科学》,2002(6)。
- ㊷吴晶妹:《评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载《经济评论》,2002(3)。
- ㊸周诚君:《外生利率下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5)。
- ㊹周英章、蒋振声:《货币渠道、信用渠道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中国1993-2001年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含义》,载《金融研究》,2002(9)。
- ㊺郑超愚:《中国总需求函数及其货币政策含义》,载《金融研究》,2002(5)。
- ㊻刘伟等:《货币扩张、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制度创新》,载《经济研究》,2002(1)。
- ㊼谢平、罗雄:《泰勒规则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载《经济研究》,2002(3)。
- ㊽谢德仁:《企业的性质: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之履行过程》,载《经济研究》,2002(4)。
- ㊾黄桂田、李正全:《企业与市场:相关关系及其性质》,载《经济研究》,2002(1)。
- ㊿盛宇明:《论公有制企业的政治性及双层代理结构》,载《经济学动态》,2002(1)。
- ①杨端龙、刘刚:《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载《经济学》(季刊),2002(3)。
- ②沈越:《从美国公司信誉危机看“一元制”公司治理的缺陷——兼论我国公司治理框架选择》,载《当代经济研究》,2002(12)。
- ③李自杰、许远娜:《权力变化与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载《当代经济研究》,2002(10)。
- ④杜莹、刘立国:《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02(11)。
- ⑤⑥孙稳存、彭彩霞:《中国消费函数的分析与估计》,载《经济科学》,2002(6)。
- ⑦谢建国、陈漓高:《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一个基于跨期替代模型的中国经验分析》,载《经济科学》,2002(6)。
- ⑧汪红驹、张慧莲:《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载《经济科学》,2002(6)。
- ⑨朱国林等:《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载《经济研究》,2002(5)。
- ⑩戚聿东:《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分拆式改革的误区分析及其出路》,载《管理世界》,2002(2)。
- ⑪于良春、黄莉:《英、美电信产业管制体制之比较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经济评论》,2002(5)。
- ⑫李保明:《竞争的自由与效率》,载《经济评论》,2002(4)。
- ⑬魏后凯:《中国制造业集中与市场结构分析》,载《管理世界》,2002(4)。
- ⑭马龙龙、裴艳丽:《我国农产品市场结构及其形成和不断强化的原因分析》,载《管理世界》,2002(10)。
- ⑮莫宇斌等:《人为垄断下的超额利润、趋同化竞争与业间合作》,载《经济评论》,2002(6)。
- ⑯江小涓:《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载《经济研究》,2002(9)。
- ⑰贺俊、毛科君:《市场开放、组织变迁与产业绩效》,载《经济评论》,2002(6)。
- ⑱徐建斌、尹翔硕:《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载《世界经济》,2002(1)。
- ⑲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2)。
- ㉑仲鑫:《贸易自由化渐进性与中国外贸政策的适应性》,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3)。
- ㉒李婧:《解析人民币钉住美元制》,载《管理世界》,2002(9)。
- ㉓林伯强:《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估计与实际汇率错位的测算》,载《经济研究》,2002(12)。
- ㉔李亚新、余明:《关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与应用研究》,载《国际金融研究》,2002(10)。
- ㉕卜永祥、秦宛顺:《关税、货币政策与中国实际均衡汇率》,载《经济研究》,2002(5)。
- ㉖许岩:《汇率、利率、税率:名义和实际》,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 ㉗张长春:《影响 FDI 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载《管理世界》,2002(11)。
- ㉘沈坤荣、田源:《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载《管理世界》,2002(11)。
- ㉙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2(4)。
- ㉚武剑:《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载《经济研究》,2002(4)。
- ㉛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6)。
- ㉜王志鹏:《论外商直接投资对实际汇率的影响》,载《经济评论》,2002(2)。
- ㉝杨海珍、Frank R. Gunter:《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9)》,载《经济学》(季刊),2002(3)。
- ㉞卢力平、李瑶:《对外直接投资与资金均衡模型》,载《国际金融研究》,2002(7)。
- ㉟张晓朴:《入世后中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4)。
- ㊱李庆云:《中国进入 WTO 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载《经济科学》,2002(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S)